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5年文学批评:

致力于建立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

□王清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2015年10月14日,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科学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提升了我们党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落实讲话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6项25条意见,成为当前今后推动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切实措施。讲话和《意见》的发表反映了国家层面对于文艺批评的高度重视,客观上也为文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指明了方向。就文学批评而言,2015年取得了扎实而稳健的成绩,为建立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论是对当下文学热点问题的思考,还是作家作品研究,本土性问题都得到了强化。

学习讲话和《意见》,强化文学批评的使命感

2015年,文艺批评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特别是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理论和批评展现了新风貌、取得了新实绩。钱小芊《结合文学创作展开文学批评》、吉狄马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文艺政策立足点》、李敬泽《“两个重要”:文艺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等文结合文艺工作实践,有力地阐述了习总书记讲话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对于文学批评的现状与问题的反思,一直在文学批评领域持续进行。面对当下变动不居的文学现状,怎样调整文学批评自身,重振文学批评的活力,增强文学批评的能力,是文学批评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与理论动力。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后,中国作家协会及时组织各省市区作协和行业作协以多种形式开展了学习教育活动。为不断把对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推向深入,把各地方作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结晶集结出版了《文学的使命与担当》一书。

继去年“文学观察”专栏后,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等报刊发表系列对话文章《中国精神是文艺之魂》《农村题材电视剧需升级换代》《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引擎》《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艺家何以先贤、先行、先倡》《自身修为也是创作的源头活水》《从高原到高峰,障碍何在》《讲述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文艺是精神的火炬》等。这些文章均就当前文学发展中的热点现象、重要问题展开探讨、辨析,直面当下文学现状,大胆言说理论问题,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战文学作为文学在特殊时代的特定表现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抗战并非一般的阶级、民族之间的斗争,而是人道与反人道、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因此,抗战本身就蕴涵着丰厚的文化意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文艺报》合作,共同推出“抗战文学巡礼”专栏,系统回顾、总结和评价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深入探讨其历史、社会、美学

意义与价值。霍俊明《抗战诗歌:思想的胜利 美学的胜利》、肖惊鸿《人民,是抗战电影的灵魂》、纳杨《抗战文学的发展与开拓》、李朝全《“新抗战文学”正在崛起》等最新文章陆续发表后,受到了较大关注,对于促进抗战作品书写不断走向深化,推出真正的传世精品,起到了有益推动作用。

近几年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抗战文学作品也获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贺绍俊《突破从“打扫战场”开始》对何顿《来生再见》和范稳《吾血吾土》的解读,从“打扫战场”的角度比较了这两部小说的叙事视角和逻辑走向,“两位作家都没有按以往的写作模式来处理,他们不是简单地再现战争的历史场景,而是将视线延伸,从这些老兵后来的生活轨迹倒溯到当年的战场,将战争历史与战后的经历打通来写”,进而深入挖掘出小说在特殊的抗战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可贵的探索。

以纪念“先锋文学”为契机,集中讨论本土性话题

如果以“85新潮”为标识的话,今年是先锋文学运动30周年,批评界对30年来先锋文学的回顾和反思成为本年度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产生了一大批有分量的文学批评成果。陈晓明在《先锋派的历史、常态化与当下的可能性》中指出:“先锋作为一个派已经无法在当代文化中存在,但作为一种精神和意识,隐藏在我们看似常规化和常态化的文学现状中,它要起到撕裂和开辟的作用。”在先锋所代表的精神力量这个意义上,对先锋的肯定获得了高度共识。南帆在《先锋文学的多重影像》中称:“文学史始终守护着先锋的位置,不是这一批人就是那一批人……总是有人在殚精竭虑地探索文学,痴迷于各种文学实验,默默地承受无数的失败和庆幸偶尔的成功。他们将先锋的探索、不屈、叛逆视为一种永不衰败的精神。”洪治纲《先锋文学与形式主义的迷障》也提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有所发展,总离不开先锋作家的不断探索和尝试,也离不开理论上的不断总结和不断完善。先锋注定是孤独的,前无古人,后也未必有来者,成功或失败不是它要掂量的结果。”

除了对先锋精神的肯定之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文学和本土性话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本土性本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无论是在30年前还是在当下,文学如何立足本土、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和文学自觉等问题,一直是文学批评中常被关注的问题。只是当回顾先锋文学的艺术遗产时,评论家们除了讨论现代主义命题,还更自觉地关注本土性问题,包括先锋派和世界文学、先锋派所处的历史、先锋文学对乡土文学的影响等,这说明,纪念先锋文学30周年不仅是为了重新确认先锋文学的历史地位,更是为了当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贾平凹的新作《老生》在对传统资源的借用上受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谢有顺《乡土的哀歌——关于〈老生〉及贾平凹的乡土文学精神》、陈思《“新方志”书写——贾平凹长篇新作〈老生〉论》等论文均致力于挖掘和褒扬其中的本土性资源及其特殊内蕴。

不仅如此,在网络文学、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文学等批评热点问题上,本土性话题也是一个共同的思考和研究方向。黄发有《网络空间的本土文学传统》称,网络文学的发展与突破,要重视从本土文学资源中吸取营养,并以创造性的化用将其转换为源头活水。

立足本土表达中国,为介入文学现场搭建新平台

11月,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琼海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铁凝谈到,越是面向世界,就越要自觉地扎根中国。一个作家为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写作,就是为人类写作。文学创作与理论创作是一个相互砥砺、相生相长的过程。作家和评论家在对话的过程中,一定会对如何生

动有力地向世界表达中国人的经验、阐明中国人的梦想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更辽阔的想象,推动中国文学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视野中,不断绽放中国精神的璀璨光芒。钱小芊指出,博鳌论坛这一形式是为了构建文学批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集聚文学评论力量,发挥文学评论对创作和阅读的引导作用,改善文学生态,推动文学繁荣发展。此外,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主办“青年批评家论坛”。论坛以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一带一路”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内在性与精神叙事等为主题,为青年批评家介入文学现场搭建新平台。

2015年青年批评家踊跃发声,迅速成长。在他们取得的批评成绩中,《寻找文学的新可能——联合文学课堂》一书是有代表性的一种。书中所收文字由“80后”学者杨庆祥、多位作家、编辑及学生的专题讨论整理而成。他们讨论了蒋一谈《透明》、徐则臣《耶路撒冷》、老村《疆土》、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李敬泽《致理想读者》、李少君《自然集》、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等文本,视野涉及文学写作与社会现状、文学批评等多个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把文学作品和作家拉进批评现场,直率交流,让批评者和被批评的对象一起“寻找文学的新可能”。

伴随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批评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打开

文学译介研究,包括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近年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随着批评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打开,相关的论著也从量的增加向质的提高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有关译介和传播效果的问题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方面呼应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一方面也是文学发展实际所要求的理论总结。比如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孙立鑫《陕西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研究》、过婧、刘云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褚云侠《在重构与创设中走向世界——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冯强《现代性、传统与全球化:欧美语境中的于坚诗歌海外传播》等研究,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海外出版和学界的一般情况梳理,或是对译本的简单比对,而是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文学译介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一定的反思和批判。只有在这样深层次的对话和交流,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充满对话和思辨的批评佳作。

走进大学校园 助力全民阅读

“中国作家北大论坛”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大学联合主办,邀请作家、批评家和学生进行交流。2015年邀请了刘慈欣、东西等作家。让大学生直接接触到作家和评论家相互砥砺、交流的现场,能让他们直接看到中国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的诸多新问题。交流对话的形式让作家、评论家和年轻的读者一起来到中国思想的前沿,共同推进文学观念的更新。

如果说中国文学必须展现中国经验,创作富于汉语文学特征的作文本,那么中国文学批评必须摆脱西方文论的话语模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批评。具体地说,文学批评必须显示出独特的问题范式、思想传统和分析路径,这是深入考察中国文学的必要前提。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从西方理论回归的问题,然而至少这已不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理论问题,因为已经有学者在扎实有效地进行着这个巨大的工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总之,文学批评不是随随便便的文字活动,而是一项充满挑战、也充满着诗性光辉和思想正义的事业。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它最大的功能仍然是对这个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和阐释。批评应行使的使命,是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在哪里,并把这种价值发现出来、阐释出来。发现文学价值、感受文学价值、呈现文学价值,这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和实践,也是文学批评的使命。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2015年10月14日,在座谈会举行一周年之际,“讲话”全文发表。为了更好地落实讲话精神,不久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暨新时期文艺观回顾与反思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读原著,悟原理,结合新时期以来文艺界的一些主要问题和现象,对当前文艺领域创作和批评实践,畅所欲言,交流讨论,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意见和建议,并对重建人民文艺的方法和可能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讲话”为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方向

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陈飞龙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不仅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关键方法和举措,更为重要的是着重强调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这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会会长赵铁信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脉络上解读“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在我国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的历史时代,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和怎样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献,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炯、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等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也讲述了学习“讲话”的心得,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意义重大。

当前文艺界的根本问题:历史虚无主义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除了肯定文艺工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工作取得的成绩外,更直面现实,痛陈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些问题一针见血,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洞察力与勇气;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之以条分缕析地指出这些问题来,既表达了他对当前文艺工作的深切忧虑,也表达了他对文艺界的要求和期待。与会者认为,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归根结底,在于历史出了问题,在于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为此,与会者结合实际,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诸多表现进行了梳理。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指出,在文艺研究领域,核心问题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史,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逐步确立的革命文艺史。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忠说,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革命历史,否定了革命文艺史。仲呈祥分析了影视界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表现,他指出,一些影视作品不仅无视革命文艺史的历史真实,甚至不尊重古代历史,打着创新的旗号,到处解构历史、戏说历史。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渝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在鲁迅研究领域的表现,主要是围绕着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做文章,颠覆了鲁迅的“革命家”称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永健提醒与会者注意新文学史编写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广东《清远日报》副总编辑唐德亮对文艺批评界的问题表示不满,指出某些歪曲历史、丑化人民的作品,不仅没人批评,反而被吹上了天。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文斌则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言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某些海外人士对我国当代文学进行是非颠倒的评价,是由其固定的立场和价值观念决定的,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应该多一点自信,少一些盲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恩波在厄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创作及其翻译为例,指出了翻译界、出版界存在的为了经济利益不考虑社会效益的问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说,现在有些号称学习“讲话”的文章内容与“讲话”背道而驰,因而,他呼吁学习“讲话”,首先要真诚。

一些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还对这些现象的理论工具、演进过程进行了勾勒。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新历史主义,其观点归纳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历史作为一种文本才能解读,二是自然界有内在秩序,人的历史则没有内在秩序。这就取消了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在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史观转向轨迹进行勾勒后指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转向越来越疏远、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和我们党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一条路线,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创作的负面表现完全吻合。

对新时期重要文艺事件的再思考

除对当前文艺领域诸多乱象及其理论根源进行梳理外,与会者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界发生的“三个崛起”“重写文学史”等文艺事件进行了再思考。

与会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三个崛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器友认为,“三个崛起”出现之时,“文革”刚刚结束,持论者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学术视野都不免受到限制,他们在清算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现象的同时,把“五四”后左翼诗歌、延安诗歌和新中国30年诗歌的主流也否定了,他们把不能代表中国新诗“方向”的一种诗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潮当成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把其中所显露的、中外诗歌史上并非新的诗学倾向当成了新的美学原则,导致新诗探索的狭窄化和浅表化,对由此而泛滥的非理性主义、非诗化倾向,以及消解新诗“人民本位”的价值理想等,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30多年过去后再看,“三个崛起”未能崛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任崔柯也对“三个崛起”进行了细致研究。他首先指出了这一争论的一个要害,即今天的文学史叙述往往把“崛起论者”和“反崛起论者”视为艺术和政治的对立,进而赋予“崛起论者”一种因反抗政治对艺术的干涉而遭受迫害的身份,使得“崛起论者”获得某种悲情形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指出,看待这一问题,应该区分三个方面:作为创作现象的“朦胧诗”、从阅读经验出发围绕诗歌是否应该“朦胧”的论争以及“崛起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越对“重写文学史”进行了深入解读。他认为“重写文学史”是在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思与创新,承接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美学热、文学主体性等问题争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产生的一场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文学运动和思想事件。他认为,文学史写作要坚持历史的、审美的立场,应充分理解作家的历史处境,充分尊重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能任由研究者的所谓主体性任意膨胀、对所谓审美性极端强调。

重建人民文艺的方法与可能

与会者还围绕重建人民文艺的方法与可能这个问题交流了意见。郑伯农、李正忠和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执行主席严昭柱等人认为,重建人民文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一些事实的清理工作,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真相。《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丁振海则认为应该重新激发批评的活力,对文艺界的不良现象要敢于表明态度。李准、董学文、曾镇南等人建议一方面要对新时期以来的一些错误理论展开有针对性的批评,另一方面要下工夫把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讲清楚,把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核心观点和范畴讲清楚。

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周锋则本着从文本出发的精神,对贺敬之等革命诗人的诗歌,尤其是其中的“自我”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说,抗战时期,在战争洗礼下,诗人们完成了两重否定,这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艺术是“远为巨大些的综合的形式”,在这种“综合”中,“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获得了内在统一。经由这样的“综合”,我们才能真正从诗学本体的角度,从哲学、史学、文学三位一体的角度深入解读贺敬之等革命诗人的诗歌。(闻礼萍)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暨新时期文艺观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综述

回顾新时期文艺观 重建「人民文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度优秀论文揭晓

由执行编委和责任编辑推荐,经过终评专家投票和评委会的最终审定,六篇论文被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度优秀论文,现予以公布(按发表时间排序):

李国华:《生产者诗学——鲁迅杂文一解》(第1期)

获奖评语:本文乃鲁迅杂文研究的突破性思考,具有耐人寻味的价值。文章从鲁迅反文章学的立场出发,在对鲁迅的文学气质整体理解的基础上,析解鲁迅杂文内在精神逻辑。这种与消费者艺术对立的精神表述,自身带有阶级政治的诗学,具有非功利中的功利,完全进入一个全新的、士大夫与小资产阶级艺术不能解析的境界。作者在阶级话语与世俗话语中把握鲁迅文本的复杂隐含,从而发现了其“在”而“不属于”的非凡价值。“生产者诗学”的提出,对鲁迅杂文的复杂性和文学性都有了理论观照,也更切合鲁迅杂文的文本实质。

马春花:《芙蓉镇》与后革命性别》(第5期)

获奖评语:文章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概念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芙蓉镇》这部批判极左路线、歌颂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重要长篇进行多方位分析,对小说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进行了分析,呈现出表象背后潜藏着的后革命性别特征:革命/性的下降与商品/性的上升。论文视角独到,观点别具一格,新人耳目,且阐述

如庖丁解牛,得心应手,酣畅自如,结论水到渠成,同时还体现出难得的现实关怀。

潘建伟:《钱锺书的旧体译诗及翻译观》(第6期)

获奖评语:诗歌翻译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和文体学问题,也是语用学问题,牵涉到译入语语境的诸多方面,讨论起来难度较大。本文选取之前很少为人关注的钱锺书的旧体译诗及翻译观这个角度切入问题,通过钱锺书如何在翻译理念上以“达”、“信”为前提,在翻译上积极调动文化资源,细致剖析了钱氏面对中西古今言意体用之美杂糅纠葛时的曲折用心。文章以小见大,分析入理,对于重新认识旧体译诗在中国现代时期的存在形态和艺术价值,具有意义和价值。

张旭东:《启蒙主义“伦理自觉”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反思〈新青年〉早期论述中的文化与国家概念》(第7期)

获奖评语:论文以早期《新青年》为对象,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标准,以特别的视角重新审视《新青年》的精神结构,从陈独秀的价值选择中看到现代思想逻辑过程中的错位——以“伦理自觉”来解决社会问题带来的思想盲区。作者认为文化自觉不能代替文化政治主题性问题,对意图伦理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梳理。论文纵横捭阖,视野开阔,质疑的逻辑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虽在揭弊五洞,指向仍在当下。

范培松、何亦聪:《论“桐城谬种”之说的谬误和谬

传》(第10期)

获奖评语:本文为翻案文章,沉钩“桐城谬种”一说的来龙去脉,力图正本清源。文章以逆俗之笔,指点文学史里的迷津,大有破门开户之感。文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排斥桐城派的策略里,看到被历史遮蔽的一隅。作者在文学学层面系统论证桐城派的内在价值,显示其文学观、文章观的丰富性,提出桐城派之文乃“教育家之文”,并从新文学家的写作中看到桐城派的余音。新文学掩盖的旧文章的妙处,得以精准彰显。文章学识深厚,一新旧说,文辞从容老到,显示出打通古典与现代的努力,为难得的佳作。

丁帆、赵普光:《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第12期)

获奖评语:本文立足于文学史的大格局,在大量的数据统计中呈现出百年间不同时期文学的研究现状,展示了最近一个时段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成就与缺失、现象与问题、热点与冷寂等复杂景观。文章从不同侧面窥见了文本研究、思潮研究和文学史意识的变迁。由数据而进入研究者的分析,尤其对民国期间学术研究的思考,诸多扎实的笔,对近60年现状的考订,亦多忧思闪现。此文在众多统计分析类文章中,问题导向突出,现场意识强,为今后学科反思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新思路,是一篇学科自省的扎实之作。